

求解“吉登斯悖论”： 评《气候变化的政治》

郭忠华*

Giddens, A. (2009).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London: Polity Press. 264pp.

2009年初的数月内，英国的气候不同寻常。先是出现了据说几十年才一遇的大雪，把整个英伦四岛笼罩在莽莽飞雪和银妆素裹之中。接着是令人窒息的经济气候，萧条的社会景象使人们对经济走势的估计从稍显乐观的“V”型不断调整为日见悲观的“U”型和“L”型走势，经济转暖越来越成为人们无法指望的事情。再就是思想气候，不断制造着思想和政治奇迹的当代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再出新著——《气候变化的政治》（Giddens, 2009）。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誉其为“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敦促每一个人阅读它”^①；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称其“做出了深刻而原创性的贡献”；《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称其为“历史终结的终结点”；《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则称之为“计划的回归”^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有关气候变化的专著本身就在搅动着思想的气候。

一、吉登斯悖论

按照作者的定位，“本书不是一本有关气候变化的著作，而是

* 郭忠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① 参见该书封面文字。

② 参见该书封底文字。

一本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的著作”(p. 16)。也就是说,它讲的是如何形成一种政治模式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气候变化至多是其论述的出发点。在著作的开篇,作者即以一种灰暗的笔调开场以表明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这既是一本有关梦魇、灾难和梦想的著作,也是一本有关日常生活例行化的著作,这种例行化给我们的生活以持续性和实质。”(p. 1)在该书中,这些梦魇、灾难表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已经造成或者即将造成的结果上。例如,自1901年以来,世界的平均气温上升了 0.74°C ,如果以当前气候变暖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100年世界平均温度将上升 6°C ;在人类历史上,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290ppm以下,但最近几十年来,其增长率逐年提高,2007年的增长率为2.14ppm,2008年为2ppm,二氧化碳含量达到387ppm;北冰洋的冰盖以每12年近3%的速度在融化,如果以这个速度融化下去,到2030年,北冰洋将不再是一个坚冰覆盖的大洋,同时世界海平面也将提高26-50厘米(pp. 17-21)……总而言之,这个星球的气候如果再以这样的速度恶化下去,它将不再成为人类的栖身之所。

众所周知,气候变化并非气候本身所使然,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2007)公布的报告,当前的气候变暖,90%是由于人类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所造成的,包括化石燃料的使用、土地利用的方式等。气候变化起因于人类自身,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就依赖于人类自身。但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尽管大多数公民都知道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但却很少有人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而等到真正被迫采取行动的时候,那又一切都为时过晚。正是针对这样一种处境,吉登斯提出了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概念——“吉登斯悖论”(Giddens Paradox)。“吉登斯悖论”的含义是:“既然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危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是具体的、直接的和可见的,那么,不管它实际上有多么可怕,大部分人就依然是袖手旁观,不做任何具体的事情。但是,一旦等情况变得具体和真实,并且迫使他们采取实质性行动的时候,那一切

又为时太晚。”(p. 2)

这一稍显繁琐的“吉登斯悖论”实际上突出的更是一种心理的悖论：当存在采取行动的余地时却不采取行动，当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却没了行动的余地。这个概念与著名的“奥菲悖论”(Offe Paradox)并不属于同一种类型。在分析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时，奥菲(Offe, 1984: 153)提出：“资本主义不可能‘与’福利国家同时存在，然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福利国家来解决其必然导致的各种毁灭性后果，但另一方面，福利国家用以解决这些后果的政策又使资本主义的存在越来越成为不可能。由此可见，“奥菲悖论”表明的是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如果继续深究吉登斯悖论产生的原因，我们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瑞士心理学家布洛(Bullough, 1912)所提出的“心理距离”(psychical distance)；二是奥尔森(Olson, 1971)所分析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里的心理距离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热爱”、“憎恨”等无关，而是单指物我之间由于“自然距离”的增加而形成的冷漠递增机制。米格拉姆(Stanley Milgram)试验表明，当被电击的“学生”在物理空间上远离了操作电击器的“老师”的视野时，“老师”服从“指导者”命令的意愿也就大幅提升。同样的解释(原理)用在吉登斯悖论上，那就是当气候变化的危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具体、不直接、不可见时，人们对它的心理紧迫感以及相应的行动积极性也就大大降低。从集体行动的一面来看，气候显然属于一种公共物品，当自利的“经济人”与公共物品相结合的时候，如果没有强制的存在，那么必然产生“搭便车”的现象。体现在气候变化上，那就是每一个人都不愿付出边际成本来改善这种大家受益的气候，最终造成没车可搭的后果。

当然，实际的搭便车者也有着诸多的类型。一是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但却不愿采取实际行动者。以SUV(Sports Utility Vehicles)为例，在英美等工业化国家，大部分人驾驶此类车

型，同时它也是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尽管大部分人知道二氧化碳排放与气候变暖之间的关联，但面对广泛的使用者，个人的普遍反应是：“我是想不用这种车了，但我个人不用又能带来什么差别呢？”或者干脆就是“以后再换吧”。二是怀疑论者。在这一类人看来，气候变化问题完全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耸人听闻的问题。千百年来，世界的气候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波动和变化。与一千多年前相比，今天的气候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而且花如此多的钱用在诸如二氧化碳的减排问题上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在当今世界，还存在更多比气候变暖更加严重的其他问题，如核武器、恐怖主义等。搭便车者不仅体现在普通公民身上，在政治领导者、民族国家那里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例如，部分政治领导者一边大谈对气候变暖问题的重视，而自己的生活方式却未做任何的调整。当然，也存在其他一些不是搭便车者的情形，那就是环保主义者。但在吉登斯看来，他们所奉行的“拯救地球”、“预防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等一方面已沦为一种口号，另一方面这些原则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pp. 57 - 64）。“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与‘拯救地球’无关，无论我们对地球做什么样的事情，它都将继续存在下去。”（p. 56）

二、气候变化的政治

在吉登斯看来，面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一潜在危机，已经存在的搭便车主义者、怀疑主义者、乐观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的思维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环保主义者尽管一直充当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先锋，但其思路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出于对自然保护的重视，他们骨子里希望建立的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发展的社会”；出于预防在先的行动原则，他们没有看到危机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机会；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则没有看到“可持续”与“发展”之间的张力——前者意味着延续性和平衡，后者则意味着动态和变

化。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吉登斯提出了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气候变化的政治”（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在他看来，“我们还不存在气候变化的政治。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实现限制全球气候变暖的抱负，我们尚不具备必要的政治革新纲领。”（p. 4）气候变化政治针对的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在这一总体目标的指导下，它由一系列关键概念或者纲领所组成：保证型国家（ensuring state）、政治融合、经济融合、充分重视（foregrounding）、气候变化的正面、政治超越、百分比原则、发展规范（development imperative）、过度发展、前摄适应（proactive adaptation）以及可持续、污染者买单。在他列举的这些概念（pp. 68 - 72）中不存在国际合作的概念，但作者在本书最后专门以两章的篇幅论述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因此，从总体上看，这些庞杂的政治革新纲领大致可以划分为一般性指导原则、政治维度、经济维度、国际维度等方面，其中政治维度显得尤其重要。

首先，气候变化政治的一般性指导原则大致包括充分重视、气候变化的正面、百分比原则、过度发展、可持续等概念。必须说明的是，作者并没有对其中的每一个概念都做出详细的解释。从总体上看，这些一般性指导原则主要体现在如下指导思想上：政治领导者或者一般大众都必须真正重视当代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而不是仅仅摆出某种姿态甚至通过这种姿态来捞取政治资本；通过各种制度性机制使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政治议程的核心；改变一直以来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偏见，气候变化问题不是只有负面的作用，它还存在正面作用，例如，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形成长期和持续性政策，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社会关怀度等；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不能采取环保主义者的一味预防原则，必须坚持“百分比”的原则，衡量气候变化的风险与机遇，引入周密的风险衡量机制；重新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当经济发展超过一定的发展水平以后，两者的关系将潜在地出现问题，因此必须把经济发展、气候变化等问题整合起来思考，不能只顾经济发展的目标；在

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时，要着眼长远，要以中长期发展战略来指导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

其次，在政治维度上，气候变化的政治主要体现在保证型国家、政治融合、政治超越等原则上，其中尤其以保证型国家作为核心。保证型国家的含义是：“国家负有监管公共目标的责任，并确保以一种可见和可接受的方式使之得到实现。”（p. 69）更具体地说，在解决气候变暖问题上，保证型国家至少具有以下职能：制定着眼长远的政策；帮助人们形成超前的思维；把气候变化的风险置于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的背景下通盘考虑；促进政治和经济融合；确保污染者买单原则的制度化；干预有碍于气候变化问题解决的经济利益；确保气候变化处于政治议程的核心地位；形成适当的经济、财政框架，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为气候变化将带来的各种后果预先做准备；整合地方、地区、国家以及国际的气候变化政策等等（pp. 91 - 94）。所谓政治融合，指的是把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政策与其他公共政策整合在一起，使它们形成一种相互拉动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整合领域为气候变化政策与社会福利政策的整合。例如，SUV 尽管给人们带来很大的自由和流动性，但它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因此，可以重点考虑升级公共交通体系或者其他清洁的途径，从而既解决交通堵塞问题，又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政治超越指的则是气候变化政策必须独立于党派和意识形态之争，要使之成为不论哪一个党派执掌政府，它都始终处于政治议程的中心，从而使问题能够得到持续解决。

再次，气候变化政治的经济维度，其主旨在于以经济的手段来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其内容主要表现在经济融合、前摄适应、污染者买单等原则上。所谓经济融合，主要指把低碳技术、低碳市场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与经济竞争性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要以市场的手段来促进低碳市场的发展，使气候变化政策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经济融合政策企图达到两方面的目标：一是使经济具有竞争性，二是促进气候变暖问题的解决。前摄适应建立在一种高度现实

主义的基础上，即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解决，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它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严重并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预先的适应性准备变得极为重要。它包括两方面的准备：一是对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弱点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从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二是建立全方位的保险覆盖网络。在吉登斯看来，“就适应而言，保险的改革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p. 172）。私人保险公司在形成这种前摄适应方面尤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关键在于国家必须建立有效的经济或者财政杠杆，使保险业逐步覆盖各个领域。污染者买单的含义非常明显，即“谁污染谁买单”。实现这一原则的途径是开征“碳税”（carbon tax）等相应税种，对碳排放超过一定指标的人征税。“税收是国家公共政策的主要杠杆之一，它在尽可能减少排放方面当然具有广泛的作用”（p. 149）。

最后，国际维度方面，吉登斯在该书中以两章的篇幅分析了解决全球气候变暖所存在的国际性问题及其应对思路。从国际的视野来看，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主要责任人，但是，中国、印度、巴西等几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成为世界最大的污染源。当前，从总量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污染源，尽管按人均污染排放指标衡量，中国只有美国的 1/5（p. 183）。近二三十年来，国际社会尽管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如里约“地球峰会”（1992）、《京都议定书》（1997）、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2002）等。尤其是《京都议定书》，就 2008 - 2012 年的全球减排目标确定了明确的比例。但是，由于民族国家之间利益和观念的分歧，这些减排方案或者沦为“计算的把戏”，或者变得“内容空洞”（p. 190）。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计算、资源争夺、观念差异始终是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三大绊脚石。欧盟和联合国尽管不遗余力地推进气候变暖问题的解决，但由于它们实际上取决于成员国的权力，造成许多良好方案的实施变得倍加艰难。针对这些困境，吉登斯提出的解决方案

是“发展规范”和“多边主义”的原则。发展规范指必须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权利，经济发展是解决其长期贫困和污染的最终办法。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避免其走发达工业化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多边主义原则强调建立国家间的民主对话渠道，建立“世界共同体”。同时，这种共同体的建立尤其必须尽力解决好不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围绕石油所形成的地缘政治问题、国际碳市场问题以及美中关系问题。

三、基本评价

该书甫一出版，便在思想和政治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得益于本书所针对的研究主题。就当前的情况而言，有谁能否认近年来出现的极端天气状况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的关联，有谁又能否认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于政治的推动？当然，这种影响也得益于吉登斯本身所具有的影响。这位曾经为社会科学研究贡献过“结构化理论”、“现代性”、“全球化”、“第三条道路”、“风险社会”等风靡全球的理论的思想家，时刻没有停止过影响全球的思想气候，“气候变化的政治”不过是其抛出的又一大影响因子而已。接下来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本书的分析及其在吉登斯庞大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自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增长的极限》（Meadows et al., 1972）以来，人类环境就越来越成为一个与经济发展并重的问题。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成立（1983）、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成立（1988）、里约“地球峰会”的召开、《京都议定书》的制定、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的召开等等，各种探索解决环境问题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该书显然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它一方面契合了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凸显的环境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又代表了对以前各种努力的反思和策略调整（参阅该书第1、2、

8、9章)。这对于陷入气候变化政策困境的西方政府来说，不啻是一副新的解药。该书集各种一般性指导原则和具体策略于一身，既提出“充分重视”、“可持续”等一些稍显陈旧的指导思想，又提出一些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策略，如碳税；融气候变化政策于其他公共政策；在参照英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强化《气候变化法》、加强“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权威等。无论如何，它们对于西方国家气候变化政策的调整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另外，该书的另一个重要特色还体现在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上。一方面，作者提出必须建立“世界共同体”等许多具有“乌托邦”成份的主张；但另一方面，又时刻透露出对现实的冷峻认识，如仅依靠市民社会和市场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是不可能使问题得到解决的，现实的策略在于借重政府的权威（p. 128）。

同时，本书尽管目前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的确也存在某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地方。一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吉登斯悖论”的表达方式上。按照著名哲学大师奎因（Quine，1966：5）的定义，悖论指的是两种或者多种事实之间的彼此关联和相互抵触。吉登斯悖论表明了“行动余地”与“行动本身”两种事实，即前文所说的“有行动余地时却不行动，必须行动的时候却没有行动的余地”。仔细考察这两种事实，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和抵触程度似乎并不是那么强，至少不如“奥菲悖论”所表明的那样强。另外，从悖论表达本身所要求的简练程度而言，吉登斯悖论的表达也远远谈不上简洁。二是解决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国际合作的问题。该书所针对的对象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旨在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气候政策出谋划策。作者尽管辟两章的篇幅论述了国际的维度，但从全书的重点来看，它们并没有构成全书的中心，也远没有像前面章节那样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对策，而是偏重于问题的揭示。众所周知，气候问题远不像当今民族国家那样具有清晰的、排他性的边界。无论民族国家的边界如何清晰，全球气候注定是彼此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国家出现的气候问题完全可以影响到另一个国

家乃至全球。气候问题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对众多小国而言尤其如此。该书侧重民族国家内部（尤其发达国家内部）气候问题的解决，却相对忽视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存在。

从吉登斯庞大思想体系的构成来看，该书实际上是其重建高度现代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经典思想家的反思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之后，“现代性”成为1990年代以来吉登斯学术研究的基本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吉登斯（Giddens, 1991, 1993, 1994）一方面反思现代性给社会制度、个人心理、亲密关系等诸领域所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积极提出重建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可行之路。1994年，吉登斯出版其“社会理论”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超越左与右》（*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提出其重建现代性社会的总体设想，这一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生态、家庭等诸方案在内的社会蓝图展示了作者对于未来社会的想象。生态之维构成了这一架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宏大的社会蓝图通过其著名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Giddens, 1998）再一次以一种简洁的方式得到重现。沿着《超越左与右》所建立的理论框架，吉登斯在以后的岁月中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加以阐释和展开。该书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该框架的生态维度。它不仅切合当今时代的主题，而且还体现了作者学术研究的高度连贯性。

参考文献

- Bullough, E. (1912). Psychical Distance as a Factor in Art and as an Aesthetic Principl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5): 87 - 117.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93).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94).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书评

- Giddens, A. (1998). *The Third Way*. London: Polity Press.
-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adows, D. H. et al. (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 Offe, C.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 Olson, M. (1971).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Quine, W. V. O. (1966). *The Ways of Paradox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Random House.